



在海外延展 华文之势

每到年末，我们在回首这一年的海外华文小说时，总发现它奉献了惊喜。如同成长期的孩童，隔一段时间不见，人们便能感受到他的变化。历史的回声和生命的悸动在 2009 年的欧美华文小说中撞击出了夺目的焰火，它的灿烂映照出严歌苓、张翎、虹影、陈河、陈谦、沙石、陈玉慧等作家的美丽剪影。他们的文学创作合力形成强大的华文之势，叩开了海内外华人读者的心灵。

家国之梦

对于海外华文创作者来说，家国之梦沉重而又苍凉。他们将自己连根拔起移植到异国的土地上，儒家“齐家治国”的家国梦伴随着人生的困厄、精神的孤寂、文化的阵痛和自我实现的欣喜，反复地隐藏和苏醒。它是驻扎在海外华人心中的执念。

家族是张翎小说的重要符号。在她之前的创作中，温州梦与异国梦构成了交错的两岸。《金山》让张翎心中的家国之梦拓展和深化。《金山》以恢宏的叙事开启记忆之门，方家三代人在加拿大的求存经历，既锻造了一段华人传奇，又谱写了一曲家族悲歌。张翎检视着历史的年轮，用文字为“长眠在洛基山下的孤独灵魂，完成一趟回乡的旅途”。方得法脸上的刀疤，六指困守的碉楼，凝聚了两份刻骨铭心的现实经验。刀疤是华人为争取在异国的生存权所付出的代价，碉楼是留守故园的亲人孤独一生的凭证。锦山、锦河、锦绣，三个倔强的生命，喻示着“山河锦绣”的美好憧憬，它承载着海外华人怀乡的浓郁和还乡的企盼。张翎家国之梦的内核始终是情。尤其是六指的命运令人扼腕慨叹，她耗尽了生命元气等待一张去金山的船票，而当船票来临的时候，她一次次承受了命运的摆布和时代的戏弄。小说对残酷现实的逼真再现给予读者强烈的心灵震撼，张翎的叙事风格随着《金山》由温婉典雅转向冷静犀利。

严歌苓的《寄居者》呈现了另一种家国之梦。小说记录着犹太人企图在上海重组被战争打碎的家国梦。彼得一家的家国梦跟着他们在欧洲—亚洲—美洲之间的迁徙而辗转，它的核心就是血统的延续。美国护照不仅是他逃脱“终极解决方案”的通关文牒，更是家族传承的救命稻草。同时，小说也平行关注在美国的华人寄居者如何实践家国之梦。“唐人街”就是 May 的父辈家国之梦的再造。但是，神圣的家国梦包裹不住尊严的失落和人性的泯灭。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华人，都没有逃脱被物化的宿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货”。一个悲凉的事实披露开了，在危险混乱的年代，在生存面前，谁都是可以任意践踏的草芥。

民族之义

几十年海外华文小说的发展见证了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灵魂蜕变。对中华血脉的捍卫和坚守是创作者所秉持的民族立场和思想理念。陈河作品，为华人对民族性的认知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颖的解释。

陈河的小说是 2009 年欧美华文文学的重要收获。《黑白电影里的城市》《信用河》《无花果树下的欲

望》《沙捞越战事》等，呈现了新鲜的小说题材。陈河的个人经历复杂又惊险，这为他的创作建造了庞大的素材库。小说的故事背景关涉中国、加拿大、阿尔巴尼亚、马来西亚丛林，叙事风格在“行神如空，行气如虹”的劲健中流转着“萧萧落叶，漏雨苍苍”的悲慨。《沙捞越战事》是一部独特的战争题材小说，它钩沉和纪念在二战中牺牲的默默无闻的华裔英雄。主人公周天化面对着日军、英军、土著、游击队，从容不迫地传递情报，多次化险为夷，为战局的扭转作出重要贡献。在我看来，小说的重要性在于深刻地探讨了民族本性以及族群关系。中日关系是最为重要的论题，小说对战争中的中日关系的处理不是约定俗成的。陈河既花笔力展现了日本对东南亚的血腥控制和对生命的野蛮摧残，折射出华裔对日本军队的厌恶和仇恨；同时，作者表达了在异国的土地上，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无根的外族，他们一直背负着被驱逐的共同命运。周天化信奉自己是加拿大人，他选择参战源于他的反战信念，而非主动拯救日军铁蹄下的中国。如此民族观的展现，无形中与中国传统民族观产生冲撞。对中国人来说，这确实是一种必须承认的事实允许，可又是一番冷酷的情感背叛。

两性之战

两性关系是海外华文小说的常见议题。2009 年，陈谦的《望断南飞雁》和虹影的《好儿女花》，都以家庭为缩影，在夫妻两性大战中坚守女性地位和尊严，张扬女性的个体独立意识。

《望断南飞雁》中，机械的主妇生活扼杀了南雁对幸福的先期规划，她被强行灌输了一整套“从属”和“依附”的为妻哲学。在理想和现实的反差折磨下，她最终选择捍卫自由和追寻梦想。在丈夫收获终身教职之际，年届四十的她决然成为出走的“娜拉”。陈谦将语言锤炼得更为精致细腻，小说含纳女性真实的心理世界，洒脱的生活态度、执着的人生追求，但还未能有创作题材的创新和人物刻画的突破。

《好儿女花》是虹影在 2009 年末向男权主义射出的艺术利箭。题材的真实和敏感一度喧宾夺主，迎合了受众对名人生活的猎奇和偷窥，抢去了作品思想与艺术上的光华。《好儿女花》是从虹影对女性尊严被漠杀的悲愤中开出的花朵，她通过母亲、姐妹和自己的故事，将女性在家庭中对男性卑微屈从的痛苦、无言隐忍的挣扎、放手释然的潇洒一一呈现。女儿的出生促动了虹影重新廓清自己和母亲的人生轨迹；生父之谜和丈夫之谜激发着虹影对女性存在价值的深度思索。《好儿女花》的语言仍旧透露着虹影作为诗人的敏锐与才情。对母亲和女儿的爱昭示着虹影纯真的创作本性，而这正是她从《饥饿的女儿》开始，不断打开人性之门的神秘咒语。

文化之辩

“边缘人”从於梨华、白先勇等人笔下流转进了 21 世纪，而在现今欧美华文小说中，我们愈加发现它的文化使命即将终结，华人已不在文化的夹缝中蜷缩和徘徊，而是从容地实践文化的跨越和主宰。在 2009 年，中西文化比较依然是欧美华文小说的关注

重点，对文化之异的强调早已让位于对文化之同的呼唤。“和而不同”是海外华文创作者对待文化之辩的共同态度。对中华文化的执著固守和对西方文化的坚决排斥，只会让海外华文小说中的“部落主义”者，成为当下世界里的堂·吉珂德。

沙石推出了小说集《玻璃房子》，他用中国传统小说的手法揭开人类隐秘人性中“力比多”的秘密。小说的特点在于作者对西方世界中普通华人的关怀，不是将其作为“边缘人”，而是将其放置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之中，甚至在某些时刻充当起了美国人的拯救者。

袁勃梅的《老康的哲学》，在老康和戴小观的冲突中，将这一老一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行着对比，从而凸显出文化的是既定的存在，不可强行扭转。“和而不同”才是当今海外华人文化观的恰当表达。“明摆着，两条海岸线对不上。对不上地方就是他们各自守着的那片海岸的特殊之处。”袁勃梅用“海岸”意象分析中西文化关系，颇有新意。

《CHINA》是一部唯美浪漫的小说。它通过 18 世纪一个西方矿物学家魏瀚的中国游记，讲述了中国瓷器艺术的灵秀神韵和精深内涵。陈玉慧用闪烁着“莎剧”神采的小说介绍了中西方制瓷的详细过程和瓷瓷的美学标准。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说：“路过而不进城的人眼里，城市是一种模样；在困守于城里而不出来的人眼里，她又是另一种模样；人们初次抵达的时候，城市是一种模样，而永远离别的时候，她又是另一种模样。”这段文字恰可以用来注解西方人魏瀚的人生。在小说中，澳门、景德镇、紫禁城都是中国的文化名片，魏瀚正是在对城的认识中，一步步理解中国文明的神髓。小说的文化核心是中西艺术的比较，并表达对中西文明共同尊重。《CHINA》展现了与欧美大陆新移民小说不同的文化触觉和阅读体验。

还有三部小说加入了 2009 年的众声喧哗。严歌苓的《赴宴者》、李彦的《红浮萍》在大陆首次出版了中译本，同时，陈玉慧代表作《海神家族》也跃入了大陆读者的视野。三部作品，三个有意思的关注点。《赴宴者》通过一位下岗工人紧张刺激的“伪记者”经历，铺展开社会各色人等的现实主义人生。当下中国的热门话题和热门事件，在这部小说中竟然被一网打尽了。严歌苓贯彻了她一如既往的文学诚恳，进行对人生酸楚的表达和人性复杂的揭示。《红浮萍》用时代、政治和人性三个关键词，串联起了华人女子“平”的家族史。李彦从三代女性命运的书写中，袒露了时代和政治对知识分子联手格下的精神创伤和肆意纵容的人性扭曲。《海神家族》以台湾的妈祖为精神皈依，以寻根为叙事线索，通过三代台湾人的家族故事，造就了一部家族史诗和乡愁史话。

需要注意的是，2009 年度欧美华文小说的故事固然精彩，但缺少了一些个性独特的人物形象。小说开发了环境典型，却很少深入精思人物典型。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诗虽奇伟而不能操磨人细，未免粗才；诗虽幽俊而不能展拓开张，终窘边幅”，欧美华文作家应更着力用笔之精，继而延展华文之势。

觉、听觉、视觉高度的敏感。一些海外华文作家由于文化差异、语言不畅、生活动荡等原因，产生“失根”的感觉，逐渐艺术感觉萎缩，失去创作能力。然而异域生活不仅没有淹没严歌苓，反而成全了她。严歌苓对人性的奥秘有异常的天生的敏感，这使她有可能超越半路出家的西方文化知识，穿透异域生活的复杂表象，看透本质。出国对于严歌苓来说，是获得了观察人性的新角度，新参照，有可能立体全方位地透视和把握人性。

与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留学生文学”相比，新移民文学作家更多地获得了艰难融入西方社会后从容观察的心境以及相对理性的态度。他们的作品中为读者更多提供了观察当代中国更为新鲜和具有启发性的视野。刘复生对袁勃梅作品《罗坎村》《老康的哲学》进行了文化意义上的解读，两部都有批判中国文化的主题。《罗坎村》主要批判的是宗法制度或儒家文化的差序结构，《老康的哲学》则主要批判等级制观念或缺乏民主精神、不尊重个性的民族性格。刘复生认为，这种文学书写可看作是启蒙主义的自我升级版。当袁勃梅把相对真切的中国经验（而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神话的美国）作为一种批判性资源，用它来审视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危机时，有其合理性的价值。渗透在制度安排和生活世界中的某些美国文化价值自有其借鉴意义，这里面有对美国价值的美化，也有对自己身上残留的中国思维方式的自嘲。尽管袁勃梅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大可讨论，但她无意间触及的种种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也有海外华文作家将眼光投射在日常生活之中。陈谦的《覆水》《特蕾莎的流氓犯》《望断南飞雁》可称为“性别三部曲”。三个小说的女主人公都很强势，夫妻之间有“阴盛阳衰”之势。黄伟林认为，陈谦以一种反省的态度面对强势女主人公的人生状态，以其特有的敏锐，触及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阴盛阳衰”现象，写出了一些女性精英“飞起来了”的事实，从而引发人们对均衡的两性生态的思考。（华 文）

集结到民族复兴的旗帜下

□陈建功

《新纪元香港作家文丛》共收录 21 位香港作家的作品。这 21 位作家，有些我不仅熟知他们的大作，而且相交甚笃，有些却又仅仅拜读过作品而未曾谋面，有些简直就是素昧平生。不过，《文丛》的标题为“家国情怀集结号”使我顿感亲切，即便是素昧平生者，也如“老友记”一般了。“家国情怀”这中国文化独有的符号，尽管在当代曾多少次被反省，也无论这反省有多么必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情怀却是如影随形，深深地融化在血液里了。

这情怀使每一个中国人与祖国共忧患。或许，在曾被殖民百年的香港，我的同胞们此情更殷此心尤炽？无论是水患还是地震，内地同胞每临危难，都牵动着香港同胞的心。当然，无论是奥运会的辉煌还是金融危机中的从容，内地的进步也足令香港同胞欢欣快慰。我想，或许就在这血浓于水的家国情怀的感召下，香港和内地，香港人和内地人，心是越走越近了。

欣逢新中国成立的 60 年大庆，香港的喜悦当然也是难以抑制的。《新纪元香港作家文丛》，应该是这喜悦的心花中绽放的一枝。

回想祖国 60 年来走过的曲折道路，今天的中国仿佛终于走上了繁荣发展的康庄大道。国庆 60 周年前夕，爱国爱港的香港作家们在“家国情怀集结号”的召唤下，联

袂出书，其情可感，其心可鉴。21 位作家固不能涵盖香港作家的全部，但我相信他们传递的是大多数香港作家乃至香港百姓的心声。21 位作家风格不一、文体各异，但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追求，有益于情感提升的努力，有益于审美养成的探索，大抵是相同的。国家的复兴，有赖于经济的发达、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善，同样不可忽视世道人心的净化、情感世界的丰润和审美情趣的养成，从这个意义上看，“家国情怀”真的是一声最为嘹亮的“集结号”，我们有理由为香港文坛的同行浮一大白。

在商业发达的香港，文学的发展，受到太多经济因素的制约，文学写作并非易事。因此 21 位作家的努力不能不令我们格外钦敬。当然，香港回归以后，随着两地交往的深入，中国作家协会最近又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恢复了发展会员的工作。金庸先生等一批香港作家欣然入会，又把香港和内地作家的交流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套《新世纪香港作家文丛》由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作家出版社出版，也算是推进两地交流的一个重要举措。不久的将来，我们还将提供机会，邀请香港作家到内地参观访问、出席笔会活动。我相信，在内地和香港作家以及澳门、台湾乃至全球华文作家的共同努力下，祖国的复兴之路上，文学之花将盛开不败。

自由穿行于“原乡”与“异乡”之间

□陈瑞琳

纵观 2009 年海外华文文坛，不仅小说界峰峦叠嶂，散文的浪潮也一浪高过一浪，成为硕果累累的丰收年。海外作家总感觉自己是海上的漂泊者，遥看此岸和彼岸，异乡人心里的摇荡就显得比本土的人更加剧烈，所以为文也很有些惊涛骇浪的气势。再加上两种异质文化的正面碰撞，从而让作者将生命的个体意识空前地发扬，在内容上、风格上也力求千姿百态。

2009 年首先来自海外的震撼是纽约的资深作家王鼎钧。《文学江湖》无论在海外还是在海峡两岸都引起惊涛骇浪。此书是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的压卷之作，副标题为“在台湾三十年来的人性锻炼”。该书谈文学，也讲人在江湖的身不由己，由此揭露出作者人性锻炼的血泪史。四部回忆录，写了 17 年，最后到《文学江湖》如此精粹。评论界认为，他的作品，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眼泪和痛苦，也看到中国人的微笑和希望。在艺术境界上，正可谓“走尽天涯，洗尽铅华，拣尽寒枝，歌尽桃花”。

2009 年海外散文的最大赢家当属美国西海岸的“金山派”扛鼎作家刘荒田。《刘荒田美国笔记》以其厚实生命体验和深沉的人生思考，赢得佳评如潮。其散文作品的突出贡献是对海外移民众生相世俗生活的“原汁”描绘，作者的目光所及纵深宽广且细致入微，塑造了移民时代独具特色的“假洋鬼子”形象，加上奇崛精粹的老辣文字，遂独成一家气韵流派。

除了散文名家的倾力奉献，2009 年的海外散文更有各路学者的创作参与。朱琦旅美十多年，其文化随笔纵横古今中外，文采斐然。《读万里路》正是他近年文化随笔的最新集结。书中由北向南从中原到江南再到岭南，由东向西从安徽到湖南再到大西北，试图以地理、历史和文化的大背景解读中国各地域文化的不同其原因。程宝林所著的散文集《故土苍茫》则重点表达了他作为农民之子的孤独和乡愁。

如果说男性作家多是以政治、文化的视角来叙述表达，那么 2009 年，海外女性散文作家则更倾向于“自我”的修为，即更擅长于表达“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旅美作家陈瑞琳的《家住墨西哥湾》，沉淀了自己面对新世界的探究与浮华，在定心潜居之后对新时代的移民故事进行了重新解读，在新的文化坐标上展开了东西

方的精彩对话。旅日作家华纯在《丝的诱惑——在日本俯拾文明符号》中，以独立的人文审美观和视角，感性细腻地触摸到日本与中国历史的千丝万缕，在风土文化的美学宝藏里每每有惊人的发现。2009 年，一部《有一种风景叫行走》的散文集也特别引人注目，作者是旅美女作家孟悟。书中的精华篇章是描写美国职场人生的体验和感悟，向读者展示了希望与绝望、真情与伪善、坚韧与宽容等饱含着生命底色的社会画卷，也是一部浓缩在异国他乡行走的所有当代华人的时代画卷。亲情散文一直是海外女作家的最爱。旅美作家依娃的《过日子的感觉》中，感人的力量正来自她对家乡、父母、童年的刻骨追忆和怀念。此书朴实温暖，虽有悲怆苦难，但文字的深处总有望升起。

散文，被誉为海外文坛的轻骑兵，也因此成就了一批优秀的报刊专栏作家。

幽默女作家吴玲瑶，多年为各类报刊撰写专栏，其价值不在数量，而在她独树一帜的喜剧风格。她善于通达地观察人生万象、另类读解现代文明，在短小文章中抒发“笑里藏刀”的喜剧智能。她温厚婉讽的艺术风格也为当代华语文坛带来一种文化心理的超越。美国《华盛顿新闻》的专栏作家宋晓亮，擅长小说笔法，写人物尤其泼辣生动，也是女作家中写亲情散文的高手。《星岛日报》专栏作家融融，善于观察自然，引发奇想，风格异异的环保散文颇受青睐。《侨报》资深专栏作家施雨，近年来关注中美文化交流，聚焦“海归”故事，笔端清丽敏捷，塑造出一代“归鸿”的面貌。

此外，2009 年还需要关注的有两部题材特殊的散文作品。一部是荣登网站销售排行榜的《华尔街这些事》，作者陈思进独闯华尔街十几年，书中生动解析了美国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终于深陷金融危机泥潭。另一部是纽约社会心理学家鲁鸣的随笔集《软能力——在竞争中胜出》。鲁鸣以其在美国生活 20 年的职场经历，深刻反思了中美教育的区别。

散文，是属于个人的文体；散文的成熟，来自于人的成熟。这种自由地在“原乡”和“异乡”之间巧妙切换的写作手法，正是当代海外华文作家鲜明独有的艺术个性。

本版责编：王 杨

■ 动 态

从乡愁情结走向文化思考——文学评论家谈海外华文新格局

近年来，以海外华文军团为主体的国际新移民文学，突破原乡/异乡、离散/怀旧、文化身份/国籍认同的精神缠绕，在直书中国经验、中国文化与中国身份等方面将华文写作扩展到全球。2009 年“庐山国际写作营”、“宜春国际写作营”的举办，《人民文学》第 12 期的“新海外作家专号”等，表明文学界对海外华文写作的关注。2010 年第 2 期《南方文坛》也将刊发一组评论文章，关注当下这一文学焦点。

海外华文写作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大陆文学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因写作者的身份、视角差异呈现不同面貌，为当前大陆文学的发展补充了新的元素和特殊的价值。刘俊认为，目前文学界重点关注的“北美新移民”作家群体的写作，无论从空间和时间维度看，都只能是完整意义上的“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一部分。文学评论界出现“以偏概全”的现象，有其研究视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性。“新移民”作家具有大陆背景，作品主要是在大陆发表，与当代文学基本同调，当代文学评论界对此毫无“陌生感”和“他质性”，“海外华文小说”与“当代小说”就在这样的情境下，形成了直接的联系和对接。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的作品，刘俊将“海外华文小说”对当代小说的补充归纳为以下几方面：中国人在封闭后重新走向世界时的心态和身影，使中国当代小说获得了开放、外望的补充；提供了在题材的新鲜之外更具“深度”的丰富。刘俊特别强调，“海外华文小说”从整体上对“当代小说”所具有的启发意

义，就是“只有当作家老实地面对文学，还文学以尊严时，才能创作出杰出的作品”。

除了宏观角度的整体观照外，评论家也对具体的华文小说作家进行了详细解读。陈福民认为，由于现代性历史境遇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文化优越感与文化挫败感纠结在一起滋生的乡愁、盲目浪漫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以非理性对抗为特征的后发国家的文化焦虑症等，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支配着海外华文写作。伴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海外华文写作的创作主体发生了变化。海外华文作家开始尝试着体验并且描述有别于“乡愁情结”或特殊地域经验的更为复杂真切艰难生存，视野和文化抱负渐次拓宽，从根本上改变了海外华文写作的状况。张翎及其写作就是这种根本变化一个的标志。张翎对文学写作的理解，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作品那种不妥协的坚硬质地，充满着人性与历史的严肃考量。张翎新著长篇小说《金山》，是上述文学品质的全面展开。小说中，人物性格与民族性格之间保持了一种相当冷静独特且充满力量的对立感，张翎摆脱了将文化差异的合理性视为文化等级与价值落差的理论偏见，不仅使人物和历史生动起来，还有意识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化观与民族观。

海外华文文学的价值受到重视，与一批新锐海外华文作家的崛起分不开，严歌苓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李兆忠认为，严歌苓的存在使海外华文写作的整体水平得到提升。她的小说有一种扩张力，充满了噢

